

序言

去年（2021）初春，北大開啟「校友終身學習計劃」，第一講選擇我的「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」，據說是斟酌再三，既考慮講者，更顧及論題，希望能吸引盡可能多的校友，實現「開門紅」。預定播出時間是2021年5月4日上午10點至12點，可那個時間段我剛好有課，只好採取錄播的方式。

兩個小時的講座，主要面向全球的北大校友，沒有邊界，超越專業，不設答問。主辦者是北大校友總會，除了要求政治上穩妥，別的沒什麼禁忌。我做過中山大學北京校友會會長，深知校友之間因年齡、學科、職業、地位等差異，立場及趣味真的是千差萬別。涉及大的歷史闡釋與現實判斷，更是矛盾重重，用年輕人的話說，「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」。既然沒辦法全面討好，那就照直說——不考慮聽眾趣味，就用我平日講課的姿態。

講座的主體部分，借用了我的兩篇文章——〈危機時刻的閱讀、思考與表述〉（2019）、〈「少年意氣」與「家國情懷」〉（2010），後面則引申開去，談論作為方法的「觸摸歷史」，以及作為功能的「思想操練」，順帶介紹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

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(2018)。最後一張PPT，談「為何不斷地跟『五四』對話」，用的是我書中的一段話：「其實，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，也都是在這種不斷的對話中產生意義的。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、跟1968年的『五月風暴』對話，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『五四』等『關鍵時刻』對話。這個過程，可以訓練思想，積聚力量，培養歷史感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，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。」

講座內容屬於老話重提，只不過略加剪輯與發揮，說實話，我沒太用力，也未有大的期待。因我在北大為研究生開設過兩輪專題課「北京大學與新文化運動」(2015年秋、2018年秋)，修課學生以中文系為主，兼及人文及社科各院系，反響還可以，但說不上熱烈。學生的期末作業中規中矩，屬於專業化操作，我推薦了好幾篇在刊物發表。但有一點，無論聽課還是討論，學生們都過於平靜，似乎讀不出老師那些「壓在紙背的心情」。

真沒想到，這回面向全球北大校友演講，效果竟出奇的好。先是講座播出的當天下午，北大校友會副秘書長發來短信：「彙總的總流量為242,189。陳老師，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地方校友組織紛紛詢問如何回看，因很多校友在旅遊，無法靜心看。對您和北大評價之高，讓我們都很感動。」這還只是當天的統計數字，事後應該還有回看的。果然，一周後，校友會秘書長告知，此講座的點擊量超過36萬，讓他們大喜過望。

而讓我「大喜過望」的則是，講座播出一個半小時後，我接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的電話，說她看了視頻很

激動，建議以此講座為基礎，製作一本小書。我半信半疑，漫而應之。作為聲名遠揚的出版家，甘琦早年畢業於北大歷史系，對母校以及對五四特別有感情，這很正常。可出版不僅僅是文化事業，還必須有商業方面的考慮。我在港中大教過書，也與香港三聯書店、中和出版社等多有合作，深知香港出版學術書籍之艱難。因此，發去她索要的講座PPT以及若干篇我談五四的文章，就此擱下，不再掛念。

未曾想，十個月後，甘琦居然來信，說疫情期間多有耽擱，但這書還是要做的，已安排好責編林驍與我聯繫。看了林驍發來的以講座為線索，穿插進好些我以前文章片段的製作方案，我不以為然，當即回了一封不太禮貌的信：

看了發來的書稿，知道你花了不少心思，希望盡可能適應香港讀者的趣味。可恕我直言，這個摘編而成的書稿，很可能上下都不著邊際，說雅不雅，說俗不俗。另外，還有個現實問題，你想收錄的那篇〈五月四日那一天〉，原是《觸摸歷史：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的導言。三年前，香港中和出版社曾推出增訂版的《觸摸歷史：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，現仍在版權期。

你跟甘琦商量，或者放棄此選題，因改造難度太大，且效果不見得好；或者以北大版的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為主幹，刪去對話與短文，增收這幾年新寫的文章。屬於小型的專題文集（15萬字左右），但不是普及讀物。

按常規，碰到我這樣不識抬舉的作者，十有八九，編輯會馬上放棄的。沒想到林驍不屈不撓，說這事可以商量，就照你的思路，改為刊行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增訂版。

難得碰到這麼認真執著的編輯，落實他們社長的指示，非要把這書做出來且做好不可。於是，我們進入具體的協商編輯流程。來回切磋了好幾次，終於敲定，所有文章重新編排，依內在邏輯而不是寫作時間，分成環環相扣的五輯：「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」、「多元並存的五四時代」、「兩代人的合力」、「五四的闡釋和傳播史」、「我的五四之路」。每輯文章前面，加一段從我文章中摘出來的「雋語」，既是警醒，也是路標，方便讀者進入。經由這一番調整，全書宗旨及整體思路顯得豁然開朗。

順便說一句，我原本建議刪去四篇訪談，但林驍認為應該保留。因為答問涉及許多話題，脫口而出，有很多精彩的判斷，「有些話說得比文章裏還痛快，刪了可惜」。可見我還是放不下「學問」與「文章」，而責編則從香港讀者角度考慮，更關注的是「話題」與「感懷」。

事後想想，她的考慮是對的。即便增加了七篇新作，此書依舊如初版序言所言，並非立論謹嚴的史著，而是帶有論戰性質的評說：「有論文，有隨筆，也有答問，只是在將『五四』作為思想的磨刀石這一點上，取共同立場。」可我並不因此而自卑。在一個專業化時代，談論五四這樣兼及歷史與現實的話題，我不僅需要撰寫多次獲獎且有英譯本的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，也不憚超越專業視野，追求具有某種內在精神力量的

論述。這也是我之所以偏愛眼前這冊不怎麼專業、近乎「有我之學」的小書的緣故。

書中各文寫於不同時期，事先沒有統一規劃，落筆難免有些重複，此乃明顯的缺憾。但我想作為一個讀書人，談論五四這樣充滿思辨與激情的巨大話題，能有若干專業發現、三兩篇好文章，或十句八句精彩的話，能被記憶下來，乃至傳播開去，那就了不起了。

這本書的初版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，這回的增訂版，增加〈危機時刻的閱讀、思考與表述〉、〈互相包孕的「五四」與「新文化」〉、〈新文化運動中「偏師」的作用及價值〉、〈直面核心文本〉、〈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〉、〈從「觸摸歷史」到「思想操練」〉、〈我的「五四」百年〉等七文。關鍵不在於字數增加了一半，而是全書結構及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，這很大程度得益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立意、催促與支招，特此致謝。

2022年5月17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
附記：

考慮到香港讀者的歷史視野與閱讀興趣，經與甘琦、林驍協商，港中大推出的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》增訂版，改書名為《未完的五四：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》。這裏的「未完」，指的是未完成、未完美、未完結、未完待續等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初版序言

碩士及博士階段專攻中國現代文學，自然而然，人生及學術路上，不斷與「五四」對話。談論小說敘事模式（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辨析現代學術轉型（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「五四」當然是重要的支點。至於直接討論新文化運動的，起碼有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；英譯本 *Touches of History: An Entry into 'May Fourth' China*, trans. Michel Hockx [Leiden · Boston: Brill, 2011]），以及《「新文化」的崛起與流播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5）。此外，還與夏曉虹合編過《觸摸歷史——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（廣州出版社，1999；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。清點下來，很遺憾，關於五四運動，我至今沒有總括性著作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，我始終認定「新文化」是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共同創造的（參見本書〈「新文化」如何「運動」——關於「兩代人的合力」〉）。這一兼及晚清與五四的思路，目前在學界仍屬邊緣，需打好地基，方能有大的建構。

除了收入本書的諸文，我還有若干關於「五四」的應景之作。說「應景」並無懺悔的意味，對於研究現代中國文學/文化/

思想/政治的學者來說，因「五四」而切入當下話題，乃責無旁貸。因為，就像我在別處說過的，「五四」之於我輩，既是歷史，也是現實；既是學術，更是精神。

本書所收十二文，長短及體例不一，有論文，有隨筆，也有答問。只是在將「五四」作為思想的磨刀石這一點上，取共同立場。答問部分夾雜個人閱歷與感受，明顯帶有主觀性。可即便是專業論文，也都是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相互纏繞。若〈「少年意氣」與「家國情懷」——北大學生之「五四記憶」〉與〈波詭雲譎的追憶、闡釋與重構——解讀「五四」言說史〉二文，自認頗為用力，且不無新意，可有心人照樣能讀出那些壓在紙背的心情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本書並非立論謹嚴的史著，而是帶有論戰性質的評論。也正因此，不列參考書目（只是隨文注出），也不強求體例一致。如此單刀直入，若能勾起讀者對「五四」的興致，進而閱讀、思考與爭辯，則本書「功莫大焉」。

2017年4月30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